

穿越「理論」之間： 「後理論時代」的理論思潮和文化建構

王 寧*

摘 要

本文試圖對當今全球化時代的知識狀況作出宏觀描述。作者認為，伊格爾頓的《理論之後》的出版並不標誌著理論的死亡，而是從某個角度預示了當代理論思潮的發展進入了一個「後理論時代」，這一點尤其可以為這一時代的文化理論之多元發展走向所證實。在作者看來，「後理論時代」的理論思潮仍有著清晰的發展演變走向，但理論本身的功能已經發生了變化，純粹的側重形式的文學理論已經進入了衰落的狀態，另一方面，過分誇大理論的功能在「後理論時代」也無法自圓其說。由於文學研究疆界的不斷擴大，文學理論與文化理論融為一體，可以用於解釋全球化時代的各種文學和文化現象。中國的文化理論研究者已經越來越多地參與到國際性的理論爭鳴中，發出越來越強有力的聲音。在這樣一個民族和語言疆界模糊的時代，超越民族主義的文學和文化理論建構已成為大勢所趨。中國的理論研究者已經具備了與國際理論前沿直接對話並對其產生影響的基本條件，而漢語的普及和強勢地位則使得以語言來代替國別編寫新的文學史成為可能。最後，作者還以「儒學的重建」作為「後理論時代」中國知識份子參與國際理論論爭並向世界輸出理論的文化策略。

關鍵詞：「後理論時代」、超民族主義、後現代、全球化、新儒學

*文學博士，北京清華大學外語系教授、比較文學與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Contemporary Theories Revisited: Theoretical Trends in the “Post-theoretic Era”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Ning Wang*

Abstract

The present article is aimed to describe from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the intellectual condition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To the author, the publication of Terry Eagleton’s book *After Theory* in 2003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 the death of theory, but rather, it anticipates from a certain angle that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Western theory has entered a “post-theoretic era”, in which cultural theory has been developing in a more and more pluralistic orientation. The author holds that theory in this “post-theoretic era” still has a clear orientation of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namely, those purely formalistically oriented theories are on the decline, but on the other hand, any inadequate over-emphasis on the function of theory is impossible. Literary theory, due to the increasing expansion of the boundary of literary studies, is merging into cultural theory, which could be used to interpret various literary and cultural phenomena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In the “post-theoretic era,” Chinese theorists have more and more involved themselves in international theoretical debates uttering more and more forceful voice on international forum. In such an age when the boundaries of nations and languages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obscured,

* Professor, English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Director, Center for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Studies,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穿越「理論」之間：「後理論時代」的理論思潮和文化建構

transnational study of literary and cultural theory has become a historical trend. Chinese theorists are now able to carry on equal dialogue with their international counterparts, and the popularizat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has all the more promoted the possibility of writing a new literary history in Chinese. As a cultural and theoretical strategy, the author in the last part puts forward his own reconstruction of Neo-Confucianism which will contribute a great deal to the world in such a “post-theoretic era.”

Keywords: “post-theoretic era,” transnationalism, postmodern, globalization, neo-Confucianism

「理論的死亡」之噪音在世界範圍內產生的影響已不是一件新鮮事了。確實，經過後現代主義大潮的衝擊，西方思想界和理論界人士所關心的一個問題是：當代文化理論界還會出現何種景觀？理論本身還能有何作為？如果理論的功能已經衰落的話，理論的作用又顯示在何處？如此等等。本文作者曾經對這些悲觀的論調做過回應，並將當今時代定義為「後理論時代」¹。在此，筆者將繼續過去的研究，旨在對「後理論時代」的理論思潮作一番批評性描述，然後對「後理論時代」的文學和文化研究之特徵進行辨析。我首先必須指出的是，即使在西方，理論也沒有消亡，這一點體現在下列事實中。後殖民主義經過一度式微之後再度崛起，並促使學界對後殖民主義的研究與文化身份、種族問題、流散現象以及全球化問題融為一體，並在一些第三世界國家釀起了民族主義的情緒。早先的女權主義/女性主義理論批評以性別研究的形式出現，並逐步分化為「性別研究」(gender studies)、「同性戀研究」(lesbian studies)和「怪異研究」(queer studies)等，這些研究課題分別從不同的角度顯示了女權主義/女性主義的多元走向。全球環境的惡化導致文學批評中生態理論話語的異軍突起，注重環境寫作和對經典文學文本的生態視角閱讀，使文學作品中被隱匿的意義得以被發掘出來。隨著全球性移民浪潮的愈演愈烈，「流散」(Diaspora)現象日益引起人們的注意，而作為其必然結果的「流散寫作」的崛起，尤其是華裔流散寫作的崛起，則在某種程度上起到了對文化重建和文學史重新書寫的導向作用。文化研究在當今時代已愈來愈不滿足於英語世界的局限，因而逐步發展為「跨(東西方)文化」的研究。它雖然對傳統的比較文學學科產生過挑戰和衝擊，但在另一方面，又與後者形成某種互動和互補作用。傳統的「歐洲中心主義」意義上的比較文學雖然在西方被認為已經「死亡」，但它的「

¹ 王寧，〈「後理論時代」的西方理論與思潮走向〉，《文學理論前沿》第三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1-43。

跨學科」、「跨文化」以及「跨邊界」等特徵則使其在全球化的時代又獲得了「新生」。在一個以資訊傳播為主的高科技時代，人們對文字閱讀的興趣逐漸轉向對圖像的迷戀，因而出現在文學批評和文化批評中的「圖像的轉折」就有著重要的意義，它在某種程度上標誌著「後理論時代」²的來臨和理論功能的轉變。在作出上述描述後，我們應當捫心自問：在世界理論風雲中，中國學者和理論家應當有何作為？是不是仍像過去那樣，緊緊跟在別人後面亦步亦趨，人云亦云，或者僅滿足於從中國文化和文學創作中選取例證來證明西方理論的「普適性」或有效性，還是致力於建構自己的文化理論和話語？如果答案是後者的話，又應當如何著手建構自己的理論話語？這一切都是本文需要討論的問題。

一、「後理論時代」的理論風雲

2003年，特裏·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出版了一本頗有爭議的書，題為《理論之後》（*After Theory*），這無疑為已經存在的「理論的終結」或「理論的死亡」之噪音推波助瀾。伊格爾頓開宗明義地指出：「文化理論的黃金時代早已過去。雅克·拉康、克羅德·列維－斯特勞斯、路易·阿爾都塞、羅蘭·巴爾特和蜜雪兒·福柯的開拓性著述已經遠離我們幾十年了。甚至雷蒙德·威廉斯、露絲·伊瑞格裏、皮埃爾·布迪厄、朱麗亞·克利斯蒂娃、雅克·德里達、愛萊娜·西克蘇、於爾根·哈貝馬斯、弗雷德里克·詹明信和愛德華·賽義德早期的那些具有開拓意義的著述也遠離我們多年了」。³他的這番悲觀的描述向我們提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後結構主義之後的西方文化理論還剩下什麼有價值的東西？理論果真「終結」了嗎？確實，按照伊格爾頓的看法，隨著上述大師的先後離去或逐漸

²「後理論時代」這個命名得益於伊格爾頓的《理論之後》一書，關於該書的評論，參閱拙作：王寧，〈「後理論時代」的文化理論之功能？〉，《文景》第3期（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5年）。

³ Terry Eagleton, *After Theory*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4), 1.

年邁，當代文化理論界再沒有出現什麼震撼人心的巨著，理論的衰落和無力使之無法面對嚴峻的現實。在他看來，由於文化理論提不出什麼新的思想觀點，因此在 9.11 之後以及其後的伊拉克戰爭之後，「一種新的即將來臨的全球政治階段已經展現在人們眼前，對於這一點甚至最為與世隔絕的學者也不能不注意」。⁴ 伊格爾頓甚至斷言，「文化理論簡直無法使對階級、種族和性別所做的同樣敘述作出詳細的說明…。它需要不惜代價去冒險，擺脫一種十分令人窒息的的正統性並且探索新的話題」。⁵ 就在該書出版不久，解構主義大師德里達與世長辭，西方文化理論進入了一個「後德里達時代」(post-Derridian era) 或「後理論時代」(post-theoretic era)。理論的衰弱使得不少批評家陷入一種「自戀」的怪圈，寫出的著作並非面對廣大讀者，而是寫給少數玩弄「元理論」演繹的學者相互引證。⁶ 人們不禁要問，難道理論真的像伊格爾頓所描述的那樣已經「死亡」了嗎？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話，那麼當今文化理論的走向如何？理論究竟還能產生何種功能？

隨著德里達的去世，作為後結構主義大潮之中堅力量的解構主義已經成為一個歷史現象，但解構的批評原則依然存在，它以不同的形式滲透到了當代人文學科各個領域。「後理論時代」的西方理論不斷地向邊緣旅行，在東方國家和地區產生了回應和變體，因此我們有必要對其發展走向作出跨文化視野的描述。我們首先要搞清楚，德里達及其解構理論留給了我們何種遺產？它所產生的「消解中心」和「挑戰權威」的結果究竟體現在何處？文學和文化理論將發揮何種功能？雖然西方學者已對此作過種

⁴ Terry Eagleton, *After Theory*, 7.

⁵ Terry Eagleton, *After Theory*, 222.

⁶ 1998年5月，我有幸應哈樂德·布魯姆（Harold Bloom）之邀在他的紐約住所和他進行了長時間的訪談。在談話中，布魯姆斷言，「理論已經死亡，現在的理論家寫出的東西只是相互間自己傳閱，或相互引證，並沒有廣大讀者，而文學則將永存」。雖然他的這番言辭不無偏激，但至少說明了西方文化理論界存在的一種現象，頗為值得我們深思。

種預測，⁷但作為中國的理論研究者，我們應作出自己的反應，從而在跨文化的理論爭鳴中發出中國理論家的獨特聲音。因此我想首先對「後理論時代」的理論風雲作出簡略的描述和辨析，並據此提出我們自己的理論建構策略。

（一）後殖民理論的新浪潮。在三位主要的後殖民理論家中，賽義德（Edward Said, 1935-2003）的影響力至今仍最大，他的去世在學界產生了強烈的反響。確實，賽義德在西方學術的中心地帶以一個有著第三世界背景的後殖民知識份子的身份發表自己的獨特言論，因此也同時受到東西方學者的重視和非議。儘管人們對賽義德本人的雙重身份提出種種質疑，但他仍然在不同的場合為自己的獨特身份進行辯解。賽義德的不同凡響之處正在於他能夠將自己痛苦的「流亡」經歷轉化為一種既能在帝國的中心求得生存同時又能在當代文壇發出批判聲音的強大動力。受到賽義德等人的啟發，一大批有著第三世界背景的知識份子也從自己的流亡經歷中發掘出寫作和批評資源，從而使得「流散寫作」（diasporic writing）在當今時代方興未艾，並越來越為研究全球化和後殖民問題的學者所重視。這應該被看作是賽義德留下的重要遺產。

佳亞特裏·C. 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 1942—）既是一位女性同時又有著鮮明的第三世界背景。她出版於世紀之交的《後殖民理性批判》（*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Vanishing Present*）是她的第一部有體系和完整理論思想的專著。這本書除了序言和一篇題為〈解構的開始生效〉（“The Setting to Work of Deconstruction”）的附錄外，整體部分分為四章：第一章題為「哲學」，第二章題為「文學」，第三章題為「歷史」，第四章題為「文化」，這種分類使人不難看出斯皮瓦克作為一位思想家的宏偉理

⁷ 在這方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美國《批評探索》雜誌舉行的 2003 年編委研討會，其主要理論性的陳述刊於 *Critical Inquiry* 30, No. 2 (Winter 2004)，部分文章的中譯文也可見《文學理論前沿》第二輯。

論抱負。其中寫得最為精彩的部分當推第一和第四部分，這正好也反映了她本人在這兩個學科領域內的深刻造詣。按照她本人的說法，「我的目的在於通過各種實踐——哲學、文學、歷史和文化——來追蹤本土資訊提供者的形象」，但是隨著她的論述的展開，「某種後殖民主體反過來卻一直在重新揭示殖民的主體，並且在挪用資訊提供者的觀點」。⁸顯然，斯皮瓦克這部著作的問世使她的批評理論達到了全球化時代後殖民理論的顛峰，她所討論的許多問題將為今後的理論爭鳴和批評實踐提供豐富的資源。

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 1949-）與他的另兩位後殖民理論同行相比，著述並不算多，但他在理論上的獨特建樹卻無人可以否認：首先，他創造性地將馬克思主義和後結構主義理論揉為一體，並且有效地將其用於自己的批評實踐，從而發展了一種頗具挑戰性和解構性的後殖民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風格；其次，他的混雜（hybridity）理論影響了當今全球性後殖民語境下的民族和文化身份研究，提出了第三世界批評家進入學術主流並發出獨特聲音的具體策略；此外，他的模擬概念以及對一些殖民地題材的作品的細讀也對第三世界批評家的反對西方文化霸權的努力有著巨大的啟迪作用，對文學經典的重構也有著推進作用；再者，他所發展出一種文化翻譯理論強有力地衝擊了翻譯研究領域內長期占統治地位的以語言轉述為主的文字翻譯，從文化的層面消解了以語言為中心的邏各斯中心主義，為翻譯研究領域內出現的文化轉向起到了進一步的推進作用。

（二）「流散」的突顯及流散寫作研究。在全球化的時代，大規模的移民致使流散問題越來越明顯地凸現了出來，並日益成為文化研究和社會學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流散現象的出現及流散寫作的興盛導致了傳統的民族-國家疆界的模糊和語言的裂變：一個流散作家具有多重民族和文化

⁸ Gayatri Spivak, "Preface," *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Vanishing Presen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ix.

身份已不足為奇。我們今天在閱讀那些流散作家的作品中，往往不難讀到其中隱匿著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他們出於對自己祖國的某些不盡人意之處感到不滿甚至痛恨，希望在異國他鄉找到心靈的寄託；另一方面，由於其本國或本民族的文化根基難以動搖，他們又很難與自己所定居並生活在其中的民族-國家的文化和社會習俗相融合，因而不得不在痛苦之餘把那些埋藏在心靈深處的記憶召喚出來，使之游離於作品的字裏行間。有了這種獨特的經歷，這些作家寫出的作品往往既超越（本民族固定的傳統模式）同時又對這些文化記憶揮之不去，因此出現在作品中的描寫往往是一種有著混雜成分的「超民族主義」的「第三種經歷」。

在當今的世界文化語境中，華裔流散作家所取得成就尤其引人注目。這主要指一些生活在海外的用英語寫作的華裔作家及其作品，例如早先的湯婷婷、黃哲倫、趙健秀和譚恩美等，以及最近新崛起的哈金⁹等，他/她們的創作實踐引起了主流文學研究者的矚目，對文學經典的重構起到了重要的挑戰作用，使得中華文化和文學率先在西方主流社會引起人們的關注。若將他們的創作放在一個廣闊的全球語境之下，我們便把他們叫做華裔「流散作家」。這些作家不只是離開祖國並散居海外，他們中的有些人近似流亡狀態，有些則自願地散居在外或流離失所，他們往往利用自己的雙重民族和文化身份，往來于居住國和出生國，處於一種「流動的」狀態。流散現象早已對英語文學史的重新書寫產生了影響，國際英語文學研究已成為一門新興的學科領域。這一新的以語言來劃分文學疆界的趨勢早在上世紀 80 年代的文學撰史領域就已出現，而全球化時代後殖民主義理論思潮的再度崛起則對此起到了有力的推進作用。

（三）全球化與文化問題的研究。關於全球化與文化問題的討論不僅在當今的西方學術界而且在中國學術界也方興未艾，當今不少人

⁹ 在這裏尤其應該指出的是，哈金（金雪飛）於2006年被選為美國藝術與科學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院士，標誌著他已經超越了「華裔」作家的領地，進入了文學學術的主流。

文學者都介入了這場討論。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內，馬克思和恩格斯是最早探討全球化現象以及對文化生產和文學批評的作用的思想家和理論家，因而研究全球化與文化問題必須從細讀馬恩的原著開始。早在 1848 年，當資本主義仍是一個正在崛起的新興力量並處於發展期時，馬克思和恩格斯就窺見了其中隱含著的種種矛盾，並且在描述了資本的擴張給文化生產造成的影響時頗有見地地指出：「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於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¹⁰應該這裏所說的世界文學就是早期的比較文學的雛形。

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以及一些左翼學者也作出了相當大的貢獻。阿君·阿帕杜萊 (Arjun Appadurai) 在從文化的維度闡釋全球化現象時指出，全球文化體系經歷了某種「脫節」或「斷裂」(disjuncture)，「…探索中脫節狀態的一個基本的框架就是從全球文化流動的五個維度 (dimensions) 來考察這種關係，也即：(1) 種族的方面 (ethnoscapes)，(2) 媒介的方面 (mediascapes)，(3) 技術的方面 (technoscapes) (4) 金融的方面 (financescapes)，以及 (5) 意識形態的方面 (ideoscapes)」。¹¹詹明信 (Fredric Jameson) 在談到全球化的全方位影響時也主張從另五個方面，或者說五種形式的影響，來討論全球化現象：(1) 純技術方面；(2) 全球化的政治後果；(3) 全球化的文化形式；(4) 全球化的經濟；(5) 社會層面的全球化。¹²雖然他們兩人的觀點有些重合，但對我們結合中國的具體實踐進行進一步的理論建構仍有所啟發。我認為，既然全球化所涉及的方面早已超過了經濟和金融領域，那麼我們也應該更加開闊視野，我這裏不妨

¹⁰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頁 30。

¹¹ Arjun Appadurai,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Minneapoli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33.

¹² 參閱詹姆遜 (詹明信)，〈論全球化與文化〉，《全球化與文化：西方與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6月)，頁 105-121。

從下面七個方面來全方位地觀照全球化這一現象：(1) 作為一種經濟一體化運作方式的全球化。(2) 作為一種歷史過程的全球化。(3) 作為一種金融市場化進程和政治民主化進程的全球化。(4) 作為一種批評概念的全球化。(5) 作為一種敘述範疇的全球化。(6) 作為一種文化建構的全球化。(7) 作為一種理論話語的全球化。這就是我本人在前人和當代國際同行的研究基礎上，並結合中國語境下對全球化問題的討論，試圖從當代馬克思主義的視角對全球化進行的理論建構。¹³我認為，只有從上述七個方面來整體把握全球化現象，我們才能完整地準確地從各個維度來理解和把握全球化的本質特徵。

(四) 生態批評和生態倫理學建構。全球化時代人類生存環境的危機是地球上的資源被過分利用的一個必然後果。從事人文學研究的學者，尤其是作家對之尤為敏感。崛起於上世紀 70 年代後期和 80 年代初、目前主要活躍於美國文學批評理論界的生態批評便是對資本主義現代性造成的種種後果的一個反撥。面對全球化時代文化環境的污染、商品經濟大潮下的物欲橫流和生態環境的破壞，一些熱愛大自然的人文學者和文學批評家不得不對我們所生活的環境進行反思：我們的環境究竟出了什麼毛病？人與自然的關係為什麼會變得緊張起來？作為人文學者或文學批評家，我們將採取何種對策？對此，生態批評家均試圖面對並予以回答。

正如徹里爾·格羅特菲爾蒂 (Cheryll Glotfelty) 所定義的，「生態批評就是對文學與物質環境之關係的研究…生態批評家和理論家提出這樣一些問題：自然是如何在這首十四行詩中得到再現的？物質場景在這部小說的情節中扮演著何種角色？這出戲中表現的價值與生態學的智慧相一致嗎？我們何以展現作為一種文類的自然寫作之特徵？…」¹⁴等等。在生

¹³ 關於這方面的詳細論述，參閱拙作：王寧，〈馬克思主義與全球化理論建構〉，《馬克思主義與現實》第 1 期（2003 年 1 月），頁 83-89。

¹⁴ Cheryll Glotfelty and Harold Fromm eds., "Introduction," *The Ecocriticism Reader* (Athens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6), xix.

態批評家看來，人類的現實生活總是離不開自然環境，但是我們應該如何看待我們所生存的自然環境？是按照客觀的自然規律來美化自然還是按照人的主觀願望來改造自然，這無疑是兩種不同的自然觀。生態批評對這種人類中心主義思維模式給予了有力的回應。生態批評家從解構主義那裏挪用了反邏各斯中心主義的武器，將其轉化為反人類中心主義的目的。他們在建構一種環境倫理學方面與晚期德里達的著述不謀而合。在生態批評家看來，人類中心主義的發展觀把人從自然中抽取出來並把自然視為可征服的物件，人與自然對立的觀念造成了割裂整體、以偏概全、用人類社會取代整個生態世界的現象，產生了目前的生態危機之後果。作為以關注自然和人類生存環境為己任的批評家理應將自己的研究視野投向一向被傳統的批評所忽略的自然生態環境，把在很大程度上取自自然的文學再放回到大自然的整體世界中，以便借助文學的力量來呼喚人們自然生態意識的覺醒，這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有了一種文學批評的環境倫理學的建構。

生態批評理論也和所有的西方理論一樣，已經在全世界範圍內開始了其「旅行」，並在中國大陸和臺灣地區得到了熱烈的回應：一方面，根據中國的生態環境狀況進行生態文藝學的理论建構，旨在突破生態批評界目前存在的西方中心主義之局限；另一方面，不斷地向國內理論界介紹西方生態批評研究的最新成果，使得國內學者的研究更具有理論的規範性和學術性，並逐步達到與國際學術界平等對話的境地。對此，美國生態批評家勞倫斯·布依爾（Lawrence Buell）也有同感，而且更有信心：「我非常有信心地認為，中國藝術和文化中肯定存在著豐富的資源，它保證了中國的生態批評家在介入這場運動時是具有十足潛力的……我另外還想說的是中國對現代化的獨特經驗也將使中國的生態批評家在這一領域裏作出卓越的貢獻」。¹⁵這不僅是布依爾等西方學者對我們的期待，更是我們自身所無

¹⁵ 參見勞倫斯·布依爾、韋清琦，〈打開中美生態批評的對話視窗——訪勞倫斯·布依爾〉，《文藝研究》第1期（2004年1月），頁69。關於中國生態批評研究的新進展則可參照2005年第1期《深圳大學學報》上刊登的曾繁仁等人關於生態美學和文學批評的文

法回避的一個研究方向。

(五)文化研究的跨文化新方向。文化研究作為一種異軍突起的非精英學術話語和研究方法，其主要特徵就在於其「反體制」(anti-institution)性和「批判性」(critical)。在這方面，西方馬克思主義對文化研究在當代的發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英國的威廉斯和伊格爾頓，以及美國的詹明信等理論家，都對英語世界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評的發展和興盛起到了很大的導向性作用。由於文化研究的「反精英」和「指向大眾」等特徵，它對文學研究形成了嚴峻的挑戰和衝擊，致使不少恪守傳統觀念的學者，出於對文學研究命運的擔憂，對文化研究抱有一種天然的敵意，他們認為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評的崛起，為文學研究和文學批評敲響了喪鐘。文化研究在當代人文學術領域所佔據的重要地位已持續了十多年，有人認為它即將盛極至衰，文學研究將重返中心。我對此並不苟同。雖然文化研究也出現了不可避免的危機，但當今的全球化語境仍然更為有利於文化研究的發展，只是那種封閉的文化研究領地必須突破。在新的世紀文化研究將向何處發展呢？我認為，在「後理論時代」，文化研究將沿著下面三個方向發展：(1)突破「西方中心」及「英語中心」的研究模式，把不同語言、民族-國家和文化傳統的文化現象當作物件，以便對文化理論自身的建設作出貢獻，這種擴大了外延的文化理論從其核心——文學和藝術中發展而來，抽象為理論之後一方面可以自滿自足，另一方面則可用來指導包括文學藝術在內的所有文化現象的研究；(2)沿著早先的精英文學路線，仍以文學(審美文化)為主要物件，但將其研究範圍擴大，最終實現一種擴大了疆界的文學的文化研究；(3)完全遠離精英文學，越來越指向大眾傳媒和所有日常生活中的具有審美和文化意義的現象，或從人類學和社會學的視角來考察這些現象，最終建立一門脫離文學藝術的「准學科」領域。對於我們文學研究者而言，專注第二個方向也許是最適合我們的研究，它既可以保持我們自身的文學研究者身份，同時也賦予我們開闊的研究視

章。

野，達到文學自身的超越。

(六) 性別研究、女同性戀研究和怪異研究。起源于 70 年代、興盛於 80、90 年代的所謂「女同性戀研究」(lesbian studies) 以及興起於 90 年代的「怪異研究」(queer studies) 有著一定的歷史和社會背景。在西方的語境下，早期的女同性戀現象及其批評 (lesbian criticism) 與先前的男同性戀 (gay) 現象及其批評 (gay criticism) 有著密切的聯繫，但同時也與早先的女權主義運動有著某種內在的繼承和反撥關係。「女性同性戀批評尤其起源於有著女性同性戀傾向的女權主義政治理論和運動，因為它本身就是由婦女解放和男性同性戀解放運動發展而來的」。¹⁶一些知識女性，主要是白人知識女性，既不滿於婦女本身的異性戀，也不滿於男性同性戀者的那種肆無忌憚的性行為，因而她們自發成立起自己的新組織，並稱其為「激進女性同性戀者」(radicalesbians) 或把自己的事業當作一種類似「女同性戀解放」(lesbian liberation) 的運動。

女同性戀運動一出現就遭到了相當一部分人的反對，主要來自女性內部，一些傳統的女性認為這些「無性的」女人本身「有毛病」或「反常」，如同「魔鬼一般」，實際上是生理上可悲的「犧牲品」。另一些人則對之持理解的態度。比較持中的觀點以利蓮·費德曼 (Lillian Faderman) 為代表，她在《超越男人的愛》(*Surpassing the Love of Men*) 一書中號召婦女建立起一種類似自文藝復興以來一直存在于美、英、法作家的作品中的「浪漫的友誼」，但她並沒有對有性和無性的親密關係作出明確的區分，這實際上也是當代女同性戀沒有朝著畸形方向發展的一個健康的先聲。儘管迄今女性同性戀文學批評家和學者大多為白人知識女性，而且閱讀和研究的物件大多為經典的女性作品，但有色人種和少數族裔女性也開始了自己的批評和研究，這方面最有影響的早期著述為芭芭拉·史密斯 (Barbara

¹⁶ Bonnie Zimmerman, "Lesbian," *The Johns Hopkins Guide to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 ed. Michael Grodon and Martin Kreiswirth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4), 329.

Smith) 的論文〈走向一種黑人女權主義批評〉(“Toward a Black Feminist Criticism”)。

「怪異」(queer) 根據其英文發音又可譯為「酷兒」或「奎爾」，意為「不同于正常人」(non-normative) 的人，而用於性別特徵的描述而言則顯然有別于「單一性別者」。但是對於究竟什麼是「怪異」，人們至今很難有一個準確的定義。1991年，當女權主義理論家特裏莎·德·勞瑞提斯(Teresa de Lauretis) 最初使用這個術語時，試圖賦予其一種反對男性的偏見的責任，在她看來，這種偏見就隱藏在被歸劃了的並且似乎具有性別感的術語「女同性戀和男同性戀」(lesbian and gay) 之中，而將這二者混為一談實際上混淆了男性和女性的性別差異。¹⁷這一點一般被認為是「怪異」的一個顯著特徵。¹⁸正如怪異研究者安娜瑪麗·雅戈斯(Annamarie Jagose) 所總結的，「顯然，迄今仍沒有一般可為人們接受的關於怪異的定義，而且，確實對這一術語的許多理解都是彼此矛盾的，根本無濟於事。但是怪異這個術語被認為是對人們所習慣於理解的身份、社群以及政治的最為混亂的曲折變異恰在於，它使得性、性別和性欲這三者的正常的統一變得具有或然性了，因此，造成的後果便是，對所有那些不同版本的身份、社群和政治都持一種批判的態度，儘管這些不同的版本被認為是從各自的統一體那裏演變而來的」。¹⁹這實際上道出了怪異這一產生于西方後現代社會的現象所具有的解構特徵：在怪異者那裏，一切「整一的」、「確定的」、「本真的」東西都變得模稜兩可甚至支離破碎了，因此怪異在這裏所顯示出的解構力量便十分明顯了。美國怪異研究的主要理論家裘蒂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 認為，反身份的本真性恰恰是怪異所具有的潛在民主化的力量：「正如身份認同這些術語經常為人們所使用一樣，同時也正

¹⁷ Teresa de Lauretis, “Queer Theory: Lesbian and Gay Sexuality,” *Difference: A Journal of Feminist Cultural Studies* 3, no. 2 (1991): iv-vii.

¹⁸ Annamarie Jagose, *Queer Theory: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6), 116.

¹⁹ Annamarie Jagose, *Queer Theory: An Introduction*, 99.

如『外在性』經常為人們所使用一樣，這些相同的概念必定會屈從於對這些專一地操作它們自己的生產的行為的批判：對何人而言外在性是一種歷史上所擁有的和可提供的選擇？…誰是由這一術語的某種用法所代表的，而又是誰被排斥在外？究竟對誰而言這一術語體現了種族的、族裔的或宗教的依附以及性的政治之間的一種不可能的衝突呢？」²⁰這些看來都是當代怪異理論家和學者必須面對的問題。

（七）比較文學的死亡與再生。2003年，斯皮瓦克出版了一本題為《一門學科的死亡》（*Death of a Discipline*）的小書，在比較文學界掀起了一場軒然大波。但我們可以從裘蒂斯·巴特勒為她的辯護見出這本書的真諦：這本書「並未告訴我們比較文學已經終結，而恰恰相反，該書為這一研究領域的未來勾畫了一幅十分緊迫的遠景圖，揭示出它與區域研究相遭遇的重要性，同時為探討屬下（Subaltern）寫作提供了一個激進的倫理學框架…她堅持一種文化翻譯的實踐，這種實踐通過主導權力來抵制挪用，並且在與文化擦抹和文化挪用的淡化的獨特的爭論不休的關係中介入屬下場域內的寫作具體性。她要那些停留在占主導地位的認識觀念的人去設想，那些需要最起碼的教育的人是如何看待我們的。她還描繪出一種不僅可用來解讀文學研究之未來同時也用於解讀其過去的新方法。這個文本既使人無所適從同時又重新定位了自己，其間充滿了活力，觀點明晰，在視野和觀念上充滿了才氣。幾乎沒有哪種『死亡』的預報向人們提供了如此之多的靈感」。²¹也就是說，這本書的最終目的並非是要宣佈比較文學學科的死亡，而是要在這一有著「歐洲中心主義」精英意識的傳統學科內部進行革新，使之越過文學研究與文化（區域）研究的邊界，填平（以閱讀原文為主的）經典文學與（以英文為主）的翻譯文學之間的鴻溝，從而使這門行將衰落的學科經過一番調整之後重新走向新生。因此，這本書與其

²⁰ Judith Butler, *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19.

²¹ 參閱印在該書封底的專家評語。

說是一部「死亡之書」，倒不如說更是一部「再生之書」。實際上，由斯皮瓦克的這本書所引發的爭論表明，我們談論了多年的「比較文學的危機」問題終於在全球化時代有了暫時的結論：作為日趨封閉和研究方法僵化的傳統的比較文學學科註定要走向死亡，而有著跨文化、跨文明和跨學科特徵的新的比較文學學科即將或者已經誕生。這種徵兆具體體現在諸方面。首先是比較文學學科的身份認同問題。在我看來，比較文學的最高境界應當是世界文學階段，也即評價一個民族／國別的文學成就應將其置於世界文學的大背景之下才能取得絕對意義上的公正。從這個意義上說來，斯皮瓦克所說的那種為比較而比較的牽強比附式的「比較文學」確實應該死亡，而一種新的融入了文化研究和世界文學成分的比較文學學科就在這其中獲得再生。

（八）圖像批評與視覺文化研究。隨著全球化時代精英文學市場的日益萎縮和大眾文化的崛起，人們的視覺審美標準也發生了變化：由專注文字文本的閱讀逐漸轉向專注視覺文本的觀賞和閱讀，在這方面，作為後工業社會的一個必然產物的後現代美學在文學藝術上的一個重要標誌就是語像時代的來臨。美國的圖像研究理論家米切爾（W. J. T. Mitchell）對之有著精闢的解釋：「對於任何懷疑圖像理論（picture theory）之需要的人，我只想提請他們思考一下這樣一個常識性的概念，即我們生活在一個圖像文化的時代，一個景象的社會，一個外觀和影像的世界。我們被圖畫所包圍；我們有諸多關於圖像的理論，但這似乎對我們沒什麼用處」。²²當然，米切爾提出這一問題時正是 1994 年，文字文本的力量還很強，人們似乎並未注意到一個全新的語像時代即將到來，但此時當這一時代已逼進我們時，我們首先會想到近幾年在西方和中國興起的攝影文學文體（photographical genre）：這實際上也是一種跨越藝術界限、學科甚至跨越時空界限的綜合藝術。它在全球化時代的勃興預示著一種新的文體的誕生：

²² W. J. T. Mitchell, "Introduction," *Picture Theory*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6.

攝影文學文體。由於這種文體同時兼有圖像和文字表達的特徵，我將其稱為「語像寫作」(iconographical writing)，以區別於傳統的攝影文學寫作，因為在後者的以文字表達為中心的文本中，圖像僅作為附加的插圖形式，而在語像寫作中，圖像則在某種程度上佔據了文本的主導地位和意義的中心。語像寫作的第二個特點體現在，它崇尚現代科學技術，因為這一新的文體的特點恰在於，它的文字部分只起到畫龍點睛的輔助作用，或作為一種必要的補充性說明，並不能取代文學作品對自然的細膩描繪和對人物心理的刻畫，而與其相對照，它的圖像部分則要由攝像機和攝像者來完成，也就是說取決於攝像機的品質、照相者的技術水準和他取景時所帶有的審美理想。語像寫作的第三個特點在於訴諸解釋，這具體體現在這種文本的圖像往往是高度濃縮的，一幅靜態的畫面實際上蘊涵著幾十幅甚至上百幅動態畫面的意韻，而充當注腳的文字性說明也不可能一覽無餘地對之作出詳細的描述，它的畫龍點睛效果只能起到一種導讀的作用，對深層意義的理解完全取決於讀者-觀賞者的能動性解讀。因此在這個意義上說來，語像寫作的崛起並非意味著文字寫作的終結，而是對後者的審美意義的高度凝練和提升。但應該指出的是，即使語像寫作到了其發達的階段，也仍不能取代後者的存在意義和價值。

語像寫作的崛起也和網路寫作一樣，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後工業社會的資訊和電子技術的發展。首先，語像寫作的主要表達媒介是影像而非文字，這樣便賦予畫面以生動的故事性或敘事性，同時也給讀者—闡釋者留下了廣闊的想像空間。其次，語像寫作的精美畫面依賴於高科技和數位化程度，它使得藝術對自然的模仿又回到了人類的原初階段。再者，語像寫作的另一個特點是縮小了讀者與作者的距離，使得讀者同時與作者—攝影師以及語像文本在同一個平臺進行交流和對話，讀者的期待視野越廣闊，他/她所能發掘出的文本意義就越是豐富。隨著「後理論時代」理論功能的轉變，指向圖像的理論研究將越來越有助於當代視覺文化的建構。

二、超越民族主義視野的文化建構

以上所描述的「後理論時代」的理論風雲雖然大多出現在西方的語境下，但這些理論思潮在中國的理論界也產生了不同的反響和變體，因而「穿越理論之間」實際上就等於是穿越西方與中國的理論之間，同時也穿越文學理論與文化理論之間。這也許正是「後理論時代」的理論風雲所顯示出的「混雜」和「多聲部」之特徵。本文所說的「後理論時代」雖然專指文化理論的現狀，但它在一個更加廣闊的跨文化語境下仍然擺脫不了全球化的制約。近十多年來，全球化的浪潮席捲整個世界，並直接影響了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的各個方面。如果說全球化對文化和文學研究產生了很大影響的話，那麼我們完全可以進一步推論，全球化的到來不僅模糊了國家－民族的疆界，同時也模糊了學科的疆界，使得文學研究被納入一個更加廣闊的文化研究的語境之下，文化研究與文學研究不應當全然對立。「後理論時代」的理論家應當既有著廣闊的東西方文化視野，同時也應當對文化的某個方面，如文學，有著精深的研究和深厚的造詣，這樣才能承擔起文化理論建構的重任。同樣，民族／國別文學（**national literature**）也不應當與比較文學和世界文學相對立，對於這一點西方的不少有識之士早已有所認識。如果說全球化對傳統的國別／民族文學有著較大影響和衝擊的話，那麼它對比較文學和世界文學研究只能是一種促進，它使得傳統的精英文學研究的領域逐步擴大，尤其是使得比較文學的範圍擴大，從而導致文學研究與文化研究融為一體，互動和互補。在當前的西方文學和文化理論界，有相當一批著述甚豐的精英文學研究者，已經開始自覺地把（比較）文學研究的領域擴大，並引進文化研究的一些有意義的課題。他們認為，研究文學不可忽視文化的因素，如果過分強調文學的形式因素，也即過分強調它的藝術形式，就會忽視對文化現象的展示。所以他們提出一種新的文化研究方向，也就是把文學（**text**）的文本放在廣闊的語境（**context**）之下，最後達到某種文學的超越，這就是文學的文化研究，或一種文學文化（**literary culture**）的建構。我認為這一方向也許是使

我們走出文學研究和文化研究之二元對立這個死胡同的必然之路，對於我們中國的文學研究和文化研究都有著一定的啟發意義。

辯證地說，全球化在文化上的表現同時帶給我們兩方面的影響。它的積極方面體現在它使得我們的文化生產和學術研究更為直接地受到市場經濟規律的制約，而不是像過去那樣由政府發指令性的計畫來規定。但是另一方面，全球化的後果也有消極的方面，主要體現在它使得精英文化生產，尤其是文學藝術的創作，變得日益困難，如果處理不當，就會導致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對立。在有著全球化特徵的「後理論時代」，傳統的注重形式的文學理論在很大程度上為更為具有包容性的文化理論或理論所替代。任何一種出自西方的理論若要成為普適性的理論就必須能夠用於解釋非西方的文學和文化現象；同樣，任何一種出自非西方的理論一旦被西方理論界「發現」，就有可能從「邊緣」向中心運動，最後由一種帶有本土特徵的「地方性」理論逐漸發展演變成「全球性」的具有普適性的理論。由一些具有第三世界背景的西方學者和前殖民地學者共同發展起來的後殖民理論就是這樣一個例子；同樣，由一些具有中國文化背景的海外華裔學者發展建構的「新儒學」也正在全球化的語境下經歷著某種「非邊緣化」和「重返中心」的過程。可以說，經過改造和重新建構的新「儒學」必將在「後理論時代」顯示自己的獨特作用。對此我將在下一部分專門討論。

面對全球化的強有力衝擊，我在此提出的一個文化策略就是，我們中國的知識份子首先要順應這一潮流，即承認全球化已經來到了我們這個時代，我們對這一大的趨勢是無法抗拒的。但是另一方面，我們又不能只是跟著它跑，因此正確的態度便是，在不損害中國文化精神本質的前提下，我們完全可以利用全球化的契機來大力發展中國文化，使得中國文化在全世界的廣為傳播成為可能。這樣看來，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仍抱殘守缺，死守民族主義的陣地，將會妨礙我們想像力的發揮，使我們在一個競爭的機制下失去更多發展的機會。這一教訓我們完全可以從歷史的經驗中得出

。實際上，對狹隘的民族主義的抵制和超越，至少在中國的語境下有了一段漫長的歷史。

在過去的一百年裏，中國文學就始終在朝著世界開放，並且深深地受到了西方文學及其各種文化理論思潮的影響，因而不少恪守傳統觀念的中國學者認為，一部中國現代文學史，就是一個西方文化殖民中國文化的歷史，他們特別反對「五四」運動，因為正是「五四」運動開啟了中國新文學的先河，開啟了中國文化現代性的先河。而且正是「五四」運動在大力批判民族主義的同時，把中國的大門向西方大大地敞開了，最終導致了大量西方文化和文學理論思潮的蜂擁進入中國，使得中國的民族文化機制大大地被破壞了，甚至中國的語言體系也被大大地「歐化」或「西化」了。毫無疑問，現代性早已經進入了中國，並在中國的語境下產生了不同的變體，也即另一種形式的現代性（an alternative modernity）。我個人認為，中國的文化現代性的起源就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五四」時期有一個特別重要的現象，就是大量的外國文學作品，尤其是西方文學作品和文化學術思潮、理論大量被翻譯成中文。這對於刺激中國作家的藝術想像力無疑起到了積極的作用。魯迅雖然有著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功底，但他出於推進現代性的動機，竭力在一切場合否認自己所受到的傳統中國文化的影響。他在談到自己的小說創作時，曾直言不諱地說，他的小說創作只是在讀了百來本外國小說和一點醫學上的知識之基礎上開始的，此外什麼準備都沒有。當然對於魯迅這樣國學和西學功底都十分深厚的大作家和大思想家，提倡全盤「西化」只是一種策略，並不意味著就會破壞他們作品中的中國人固有的民族精神和民族主義情緒。實際上，在《阿 Q 正傳》等小說中，魯迅的這種「怒其不爭」、「恨其不奮」的民族主義情緒正是體現在他對阿 Q 身上表現出的中華民族的劣根性的深刻批判。還有另一些「五四」運動的幹將，包括胡適，郭沫若，他們通過大量的翻譯和介紹西方文學作品，對傳統的中國文學進行了有力的解構，從而形成了一個中國現代文學經典，所以在現代文學的歷史上，翻譯佔有很重要的地位。正是這些

通過翻譯而轉化為新的創作動力的產物—文學對於一種新的超民族主義的建構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當然，從今天的觀點來重新審視「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功過得失，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當年「五四」新文化的旗手們在大力引進西方理論和文化思潮的同時，忽視了向國外推介中國的文化理論和文學作品的嘗試。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大潮中，中國文化和文學固有的理論精神統統被淹沒了，那個時代的學者和理論家言必稱叔本華（A. Schopenhauer）、伯格森（H. Bergson）、尼采（F. Nietzsche）和佛洛德（S. Freud）等西方理論家的理論，而閉口不談我們自己的老祖宗的理論，更不用說儒學了。尤其值得我們今天反思的是，在這些「五四」作家和人文知識份子奮力砸爛孔家店的同時，甚至把儒學中的一些精華也一併拋棄了，因而造成了當今中國社會普遍出現的「信仰危機」。他們在大力批判民族主義的同時，又使我們進入了「殖民主義」的誤區。而在今天的全球化時代，中國可以說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不僅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大大地加快了中國經濟的發展，而且文化上的全球化也使我們得以利用這一難得的契機大力將中國文化推向世界。因此在這方面，弘揚一種新的類似「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視野的超民族主義（transnationalism）精神，應該是我們的比較文學和文化理論研究者努力的目標。

不管是研究文學還是文化，都離不開語言的仲介。毫無疑問，全球化對文化的影響在相當程度上也體現在對世界語言體系的重新繪製（remapping）：原來處於強勢地位的語言變得越來越強勢，而原來處於弱勢的語言則或者趨於消亡或者變得更加衰弱。在這方面，英語和漢語是全球化時代最為受益的世界兩大主要的語言。在全球化的大潮中，由於美國的綜合國力的強大，同時也由於過去大英帝國留下來的文化殖民主義的遺產，英語的普及和影響力無疑始終處於世界主要語言之首位。當然，英語的普及自然有其積極的和消極的方面：一方面，全球化的浪潮把英語推到了世界語言霸主的地位，在當今這個資訊社會，不懂英語簡直難以生存；但

另一方面，英語也經歷了一種身份的裂變，即從所謂的「國王的英語」(King's English) 或「女王的英語」(Queen's English) 裂變為多種不同的帶有雜質和地方土語的「世界英語」(world englishes) 或「全球英語」(global englishes)。那麼作為使用範圍僅次於英語的漢語，面對全球化浪潮的衝擊又產生了何種後果呢？既然我們並不否認，在全球化的時代，文化的全球化更為明顯地導致了文化多樣性的出現，那麼這一現象具體體現在何處呢？就體現在邊緣文化向中心的運動，也即巴巴所說的，一方面是（由西向東快速運行的）全球化進程，另一方面則是（由東向西緩慢運行的）「少數人化」(minoritization) 進程，也即另一種形式的全球化。²³可以說，未來世界文化的發展就取決於全球化與本土化之間的張力和互相制約。因此用「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 這一策略來形容這種張力是比較合乎世界文化發展的實際的。

在全球化的時代，漢語的崛起和成為另一大世界性的語言已經無可爭議。對於漢語在全世界範圍內普及的意義，我們也許只注意到了漢語疆界的拓展之積極的方面，而有可能忽視其另一方面，也即在拓展漢語疆界的同時模糊了漢語的民族化身份，使其也像英語一樣變得日益包容和混雜。對此不少語言學家難免感到憂心忡忡。但我認為，如果漢語的發展演變果真能達到這一效果的話，倒有可能早日促使漢語成為僅次於英語的世界第二大語言：它在某些方面將起到英語所無法起到的作用，而在另一些方面，則與英語一道成為可以與之互動和互補的世界性語言。全球化在文化上的進程打破了固有的民族-國家之疆界，同時也拓展了世界上主要語言的疆界，在這一過程中，有些生命力不強的語言成了文化全球化的犧牲品，新的世界語言格局已經形成。在這一大的格局中，不僅是英語，漢語也受益甚多，因此可以預見，在未來的時代，新的世界文化格局也將逐步形

²³ 參見巴巴於 2002 年 6 月 25 日在清華-哈佛後殖民理論高級論壇上的主題發言〈黑人學者和印度公主〉(The Black Savant and the Dark Princess)，中譯文見《文學評論》第 5 期（北京：文學評論雜誌社，2002 年 9 月）。

成：它不僅以國家-民族作為疆界，同時也以語言作為疆界；它決不只是一種單邊的（英語）文化（*culture*），而是多姿多彩的（多語種）文化（*cultures*）。在這一多元文化共存的新格局中，漢語文化將日益顯示出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和影響。用漢語書寫的文學和文化理論也必將從邊緣向中心運動，最終打破文化理論上的西方中心主義和英語中心主義格局。而對於漢語文化的「超民族主義」視野的研究也應該提到我們的議事日程上來：它不僅有助於海峽兩岸學者的進一步交流，同時也有助於（大）中國（華）文化及其理論在世界範圍內的復興和重構。

因此，我們不得不面對這一事實：作為僅次於英語的世界第二大語言的漢語，難道不也面臨著語言疆界的拓展和文學史的重新書寫嗎？當然，這個問題需要另文專述，但在此我只想指出，我們在將「中國文學」和「漢語文學」這兩個術語譯成英文時，往往用的都是一個英文術語，為了對這二者有所區別，我認為，*Chinese literature* 雖然可分別譯為「中國文學」和「漢語文學」，但它的開頭第一個字母 *c* 卻應有大小寫之分，因為它包含著兩個意義，也即兩種身份：前者指在（大）中國（華）本土（包括香港、澳門和臺灣）產生出的文學（*literature produced in China*），後者則泛指全世界範圍內所有用漢語寫作的文學（*literatures written in the Chinese language*）；前者應該用 *Chinese* 來表達，因為它代表了特定的文學所固有的民族性，後者則應該用 *chinese* 或 *chineses* 來表達，因為它反映了漢語本身的多元發展以及用（包括漢語文學在內的）所有語言撰寫的文學都共有的世界性；讀者也許已經注意到，前者中的 *literature* 用的是單數，後者中的 *literatures* 則用的是複數。早在上世紀 60 年代，國際比較文學協會（ICLA）就開始了大型多卷本文學史書《用歐洲語言撰寫的比較文學史》（*The Comparative History of Literature in European Languages*）的編寫工作，²⁴隨著全球化時代漢語的普及和強勢地位，我們海峽兩岸

²⁴ 這一套卷帙浩大的系列文學史書現由荷蘭的本傑明出版公司（John Benjamin Publishing Company）出版，筆者曾有幸參加了該系列《國際後現代主義：理論和文學實踐》（

的學者是否也可以通力合作編寫一部《用漢語撰寫的比較文學史》呢？我想這應該是每一位以漢語為母語的中華知識份子所義不容辭的義務。這也應該是我們中國知識份子對世界文化的貢獻。

三、全球化語境下（新）儒學的重建

現在我們再來討論中國學界關於全球化和本土化之關係的討論，因為這也是近十年來中國當代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內的一個熱門話題。確實，全球化使得世界上大多數人在政治上、經濟上和文化上都邊緣化了，但是它也始終受到另一股勢力的有力抵抗：本土化，這一點尤其體現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在中國以及其他亞洲國家和地區，近幾年來的儒學復興完全可以作為挑戰「西方中心主義」的全球化的另一股話語力量。在這一語境下，一些亞洲人文知識份子始終在致力於尋找一種獨特的亞洲的民族和文化認同，這實際上也是後殖民主義的一種亞洲變體。²⁵當全球化最初進入中國時，不少人只歡迎經濟上的全球化，因為它極大地刺激了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但是從文化上來考察，人們則認為，全球化是有害的，因為它會導致中國文化的「趨同化」而非真正意義上的國際化或全球化。而最近幾年的發展則使這些人不得不改變了原有的觀點，不僅是政府官員，而且相當一批人文知識份子已經認識到，全球化實際上始終向兩個方向運作：從中心向邊緣運動，同時也從邊緣向中心推進，進而消解了人為的單一中心，為多元文化中心的形成鋪平了道路。眾所周知，中國自古就有「中央帝國」之稱號，也就是說中國長期以來一直處於世界的中心，那麼既然在過去的一、二百年裏中國已經大大地被邊緣化進而淪落為一個處於分裂狀態的三流大國，那麼為什麼今天重新崛起的中國不能乘著全球化的東風實現自己的「非邊緣化」和「重返中心」的理想呢？既然全球化和後現代的多元思維模式賦予我們一種永無止境的探索精神，那麼我們就應當努力變不

International Postmodernism: Theory and Literary Practice, 1997) 分卷的撰寫工作。

²⁵ 參閱德里克1999年9月25日在北京語言大學發表的演講：“Culture Against History? The ‘West’ in the Search for an East Asian Identity”。

利因素為有利因素。也即擯棄全球化話語中隱含的「帝國中心」思想，使其服務於中國語言、文化和思想理論在全世界的普及。在這方面，經過改造和重新闡釋的新儒學應該能夠承擔起這樣的重任。

當前，全球化的浪潮正在席捲整個中國的經濟，這應該說是任何人也預料不到同時也難以阻擋的一個歷史潮流。它同時也將極大地影響或者說已經影響了中國的民族和文化認同的確立。全球化在當代的實踐已經證明，中國是當今世界極少數直接受益於全球化的國家之一，正是在這樣一個過程中，中國的 GDP 指數佔據了世界第三的位置，並且仍有著增長的潛力。中國的經濟正在經歷一個「脫貧困化」和「去第三世界化」的過程，但是我們的文學和文化理論又處於什麼樣的狀況呢？我認為情況並不容我們樂觀。也許在臺灣對中華文化遺產的保存大大勝於大陸，但是就在這個小島上，卻大有人鼓吹「去中國化」的嘗試。因此，我們需要思考的是，在這樣一個全球化的境遇中，我們海峽兩岸的中國人文知識份子將有何作為？我們將建構什麼樣的理論話語呢？至於第一個問題，我的回答是，中國政府和中國作家協會已經決定將一百部優秀的中國當代文學作品翻譯成世界主要的語言，尤其是英語等西方主要語言，以便使中國文學為更多的人所瞭解。但這僅僅是一種政府行為，並不能代表廣大理論研究者的探索嘗試。在文化領域，隨著漢語在全世界範圍內的普及，政府也已經決定撥出鉅資在全世界建立數百個孔子學院，以便大力推廣漢語和中國文化在全世界的傳播。但是這一嘗試也在一些國家遭到抵制。即使上述努力都能奏效，我仍然感到，這只是一種外在的力量，而非我們人文知識份子和理論研究者的文化和理論自覺。我們仍然缺乏具有我們自己特色的知識和理論話語，我們在與西方乃至國際學術界進行對話時常常陷入「失語」的狀態或重複別人的觀點，或為某一種既定的西方理論話語的有效性提供中國的具體例證。這對於我們這個有著十幾億人口和最龐大的人文學者隊伍的文化大國，實在是很悲哀的。我始終認為，我們只有擁有自己獨特的理

論話語，才能談得上和西方以及國際學術同行進行平等的對話。²⁶否則的話，我們充其量只能扮演某種西方理論話語在中國的闡釋者和實踐者的角色。即使如此，一些隻能夠簡單地閱讀西方原文著作或將其譯成中文而無法與西方學者直接在文字上交鋒的中國學者，遠不可能得到西方及國際同行的尊重，他們的那些缺乏獨創性的「研究成果」自然不可能在國際學界產生任何影響。因而這樣的「失語」狀態往往就是雙重的：語言層面上的失語和知識理論（話語）層面上的失語。

當然，不少人也許會認為，在世界範圍內建立若干個孔子學院似乎旨在恢復傳統的儒學，但在我看來，情況遠非如此簡單。實際上，「孔子」在這裏只是傳統中國語言文化的一個象徵性符號，他的教義早在「五四」時期就曾受到過猛烈的批判和鞭撻，其後又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更為激烈的「口誅筆伐」，其原因在於它長期以來一直被認為是反現代性和反共產主義信念的反動話語力量。在當今這個全球化的語境下，傳統的儒學在當今的復興正好與當前建立和諧社會的既定國策相吻合。但是儒學在當代中國絕不應當只是簡單的「復活」，而應得到新的理論闡釋和揚棄，從而經歷某種程度的「變形」：弘揚其人文主義的教義，擯棄其陳腐和封建保守的傳統。因此有選擇地並且批判地「復興」傳統儒學的倫理價值觀念在當今時代至少是有益的，而在全球化時代重建一種新的後現代儒學理論話語也是完全可能的，因為由一些海外華裔知識份子建構起來的「新儒學」的巨大影響早已超越了中國乃至中華文化傳統的疆界，它已經成為一種全球性和具有普適意義的話語。在這方面，牟宗三、杜維明、成中英等海外華裔知識份子進行了長期的不懈努力和嘗試，並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杜維明不僅經常到中國大陸訪問，在國內一流大學發表演講，而且還在中央電視臺等主流媒體接受採訪，以便向更廣大的電視觀眾宣講新儒學的教義，他的努力不僅使新儒學具有廣泛的普及性，同時也至少使其得以與那些

²⁶ 曹順慶在90年代中期以來的文章中也反復強調這種境況，但是他把這一現象誇大為一種理論上的「失語症」則是我不能苟同的。

已經被新一代中國青年廣泛接受的西方文化理論和道德準則共存和互補。既然後現代主義和新儒學都具有鮮明的解構性和包容性，也即既消解了現代性的整體性和專斷性話語的權威，同時也向我們提供了具有東方和中國特色的另一種形式的現代性，因而這二者完全可以在現代性和全球化這個層面進行有效的互補和對話。按照杜維明這位對後現代主義也頗有興趣的當代新儒學代表人物的看法，我們需要從傳統儒學中汲取的並非是政治參與的精神，而更是其內涵的人文精神，因為儒學在當代所召喚的是「具備一種更為深沉的人文主義視野，而非像人們所廣泛設想的那樣，僅僅適應於政治上的參與。儒學為其自身的發展和人類社群理想的實現而具有的象徵性資源不僅體現於政治上，同時也體現於宗教倫理上。實際上，他們對『政治』的感覺不僅體現於在經濟和社會層面來管理世界，而且也在教育和文化意義上改造世界的同時促使其政治領導地位紮根於社會良知中。儒學知識份子也許並不積極地尋求官職來將自己的理想付諸實施，但他們始終通過其詩學的敏感性、社會的責任性、歷史的意識以及形而上的洞見在政治上積極地介入對現實的變革」。²⁷杜維明本人這十多年來的四處奔波和努力實際上就是基於普及儒學進而建構一種新的“後現代儒學”理論話語之目的。應該說他的努力嘗試已經取得了初步的效果。不少原本抱有西方中心主義觀念的學者也開始對中國文化和文學發生興趣了，²⁸儒家的親密家庭觀念和忠孝倫理道德也開始進入一些美國人的家庭，並對之發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

²⁷ Wei-ming Tu, "Preface," *Way, Learning, and Politics: Essays on the Confucian Intellectual*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3), ix-x.

²⁸ 我只裏僅列舉兩個例子：後殖民理論家斯皮瓦克自2002年以來一直通過選修哥倫比亞大學的中文課程來學習漢語，並參加了該校的一系列漢語水準考試。她在出席由我主持的清華大學授予她名譽教授的儀式（2006年3月7日）上甚至用漢語致了簡短的答詞；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則在我主持的一次講座（2003年9月5日）中公開宣稱，「如果我年輕20歲的話，一定要從學習中文開始」(“If I were twenty years younger, I would start from very beginning to study Chinese.”)。

成中英作為另一位有重要影響的新儒學代表人物，近幾年來也異常活躍，他不僅在漢語世界大力推廣新儒學，而且還利用自己主編的雜誌和叢書，發表自己對在全球化時代重建新儒學的觀點，他的思想理論可以說更接近後現代和全球化的思維模式，因而更容易與後者融合、互補和對話。在他主編的最近一期《中國哲學雜誌》（*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上，他不僅在總體上闡述了民主與中國哲學的關係，而且還提供了他本人從新儒學的角度建構出的關於民主的範式。在他看來，民主的目的是「雙重的」（*twofold*）：「它旨在取得社群的持久的秩序和和諧，因為在社群中，個體成員依然可以享有自我表現的自由和不受他人主宰的自由；它同時也致力於產生並支持具有自由意識的個人，因為這些人的自由將是建立一個有序的和諧社會和社群的基礎。我相信，這兩個目的都應當同時實現」。²⁹至於政治權力與德行的關係，成中英顯然不同于他的歐陸哲學同行，他認為，「對儒學而言，一個人一旦成為統治者或公眾的官員，也不應當因此而放棄自己的德性。倒是與其相反，內在的私有德行常常會變成服務於外在公共社會和政治德行和權力中的個體的基礎和靈感的來源。我們有任何理由可以說明，充滿美德的儒家哲學完全有可能被看作並實際上作為具有雙重方向的民主化的積極仲介而發揮作用：成為權力的美德，同時也成為美德的權力」。³⁰這當然是成中英等新儒家知識份子的善良願望和美好理想，至於能否在實踐中付諸實施還有待於各級官員的努力，但至少在一價值取向和信仰發生危機的年代，提供一種好的選擇仍不失為上策。因為一個人總應該有自己的理想，就像一個作家在創作自己的作品時，明知道充滿烏托邦的想像不可能實現也偏要絞盡腦汁地把虛構的故事講得真實可信一樣。毫無疑問，對儒學的人文精神和倫理道德方面的強調顯然與當前人們普遍希望的「建立和諧社會」和「建立和諧世界」的理念相吻合，因

²⁹ Chung-ying Cheng, "Preface: the Inner and the Outer for Democracy and Confucian Tradition,"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34, No. 2 (June 2007): 152.

³⁰ Chung-ying Cheng, "Preface: the Inner and the Outer for Democracy and Confucian Tradition," 154.

而具有廣闊的發展空間。由於越來越多的人都抱有過上沒有戰事和階級鬥爭的穩定生活的願望，新儒學將成為後革命條件下的另一種強有力的話語。它既保持了傳統儒學的積極進取和入世精神，同時也擯棄了其專斷的排他性，使之成為一個不斷可供後來者闡釋和建構的開放的話語體系。在這樣一個「後理論時代」，任何一種君臨一切的「理論」都是不可能的，因此重建「新儒學」，使之成為全球化時代的另一種具有相對普適意義的理論話語便有著不容忽視的積極意義。在這方面，海峽兩岸的中國知識份子和理論研究者應該做出較大的貢獻。

總之，儒學自孔子創立以來經歷了各個時代的修正和完善，已經逐步成為中華文明和文化的一種帶有主導性意義的話語力量。在當前西方文明大舉入侵滲透進非西方文明的情況下，重提儒學的復興和重建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這同時也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它可以起到弘揚中華文明和文化的積極作用，另一方面，作為（西方中心式）全球化的對立物，是否會引發新的「文明的衝突」？我認為，答案應是否定的。作為中國土生土長的儒學在經過了數千年坎坷的經歷之後，在全球化時代的後現代語境下得到了重新建構，它作為中國文化土壤裏的獨特產物，是中國的人文知識份子據以與西方後現代理論進行平等對話的重要文化理論資源。在當前西方社會物欲橫流、人文精神受到挑戰進而發生危機的時刻，呼喚（重新闡釋和建構的）儒學的復興並以此將中華文明和文化的精神在全世界加以弘揚，應該是我們難得的契機，因此我們中國的人文知識份子和理論研究者應採取積極的對策。一方面，從後現代和全球性的視角對傳統的儒學進行改造、批判、揚棄並加以重構，使其成為當前構建和諧社會的一個重要理論資源。另一方面，又可以從全球化時代的新儒學的視角對西方的各種後現代理論進行質疑、批判和改造，從而使得重新建構的後現代新儒學成為全球化時代的多種文明和多元話語共存之格局中的一個重要方面。這樣，我們就可以達到「穿越」各種東西方的文學和文化理論並進行自覺的理論建構之目的。隨著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和綜合國力的不斷提高，隨著兩岸

文化學術交流的愈益頻繁，中華文明和文化的強勢地位將得到進一步的確立，因此，在這個意義上，重新把中國的文化土壤裏生長起來的儒學當作建構中國文化理論話語的基礎無疑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由於新儒學內部流派紛呈，觀點各異，專門討論它需要更長的篇幅，因而本文在有限的篇幅內不可能全面展開。但是在結束本文時，我只想再次強調，在當今這個「後理論時代」，新儒學的潛在功能將得到越來越深入地發掘和闡釋。作為中國的人文知識份子和理論研究者，我們自然責無旁貸。

徵引文獻

Works Cited in Chinese

近人編輯、論著

-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Marx, K. & F. Engels, *Communist Manifesto*. Beijing: People's Press, 1966）。
- 王寧，〈「後理論時代」的西方理論與思潮走向〉，《文學理論前沿》第三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1-43（Wang, Ning, “New Orientations of Western Theories in a ‘Post-theoretic Era,’” *Frontiers of Literary Theory*, Vol. 3.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1-43）。
- 王寧編，《全球化與文化：西方與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Wang, Ning ed. *Globalization and Culture: China and the West*.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2）。
- 詹姆遜（詹明信），〈論全球化與文化〉，《全球化與文化：西方與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105-121（Jameson, Fredric, “On Globalization and Culture,” in Wang Ning, 2002: 105-121）。

Works Cited in English

- Appadurai, Arjun.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Minneapolis,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 Butler, Judith. *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 Cheng, Chung-ying. “Preface: the Inner and the Outer for Democracy and Confucian Tradition.”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34, No. 2 (2007): 151-154.
- Critical Inquiry*, 30, No. 2 (Winter 2004).
- Eagleton, Terry. *After Theory*.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4.
- de Lauretis, Teresa. “Queer Theory: Lesbian and Gay Sexuality.” *Difference: A*

Journal of Feminist Cultural Studies, 3, 2 (1991): ivi-vii.

Glotfelty, Cheryl and Harold Fromm eds. *The Ecocriticism Reader*. Athens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6.

Jagose, Annamarie. *Queer Theory: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6.

Mitchell, W. J. T. *Picture Theory*.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Spivak, Gayatri. *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Vanishing Presen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Spivak, Gayatri. *Death of a Disciplin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Tu, Wei-ming, *Way, Learning, and Politics: Essays on the Confucian Intellectual*.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3.

Zimmerman, Bonnie. "Lesbian," In *The Johns Hopkins Guide to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 edited by Michael Grodon and Martin Kreiswirth, 329,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4.

